

烽火原

4

革命传统教育丛刊

I251/52

燎原

革命传统教育丛刊

4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8721



河南人民出版社

838721

责任编辑 张勋中 陈智英

革命传统教育丛刊

燎原

第四辑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32开 8.25印张 295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1105·40 定价0.77元

目 录

《刘邓大军南征记》序	李 达 (1)
刘伯承同志论中原逐鹿(续完)	陈斐琴 (5)
全局中的一着好棋	李德生 (17)
跟随少奇同志的最后年月里	贾兰勋 (25)
五位老帅战太行	李志宽 (36)
激战前夕的朱总司令	
火线上的彭老总	
常胜将军刘伯承	
东阳关上赞徐帅	
威震敌后的聂司令	
贺龙的故事	伍学生 (52)
陈少敏在豫鄂边	魏晓耘 (59)
三战三捷	林维光 (76)
豫皖苏记事	杨居人 (84)
随华东野战军转战河南日记	尚力科 (107)
情 操	张桂英 (132)
邓子恢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	刘国梁 (139)
党的“一大”中央委员——李达	姜华宣 (166)
蔡和森、蔡畅之母——葛健豪	罗绍志 (186)

南泥湾垦荒片断	谢光智 (199)
抗战初期在太原	王维先 (207)
一支地下军	郭有义 (212)
忆焦作地下斗争的年月	张方来 (230)

《刘邓大军南征记》序

李 达

一九四七年七、八、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当时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奉命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担任战略突击队的任务，实施中央突破。

当时敌人虽然在装备和兵数上仍处于优势，在两翼仍保持着攻势，但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洞察敌军的有生力量已经受到很大损失，敌人战线的中央已经转入防御，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已经形成，新的大革命高潮已经临近，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毅然决然转入战略进攻。这一决策，对扭转整个战局有决定的意义。在这样的形势下转入战略进攻，而进攻的样式又是千里跃进，釜底抽薪。因而，担任战略突击任务的部队，就不免碰到很多险关。

鲁西南战役旗开得胜，但在捷报声中，埋伏着危机。譬如：羊山战斗迁延，蒋介石认为刘伯承部攻不下羊山，则鲁西会战共军即系失败；蒋介石又继续从各地抽兵向我围攻，敌人阴谋水淹我军。真是一波三折。

这时刘邓首长的决心是：

公开揭露蒋介石决堤的罪恶阴谋，呼吁各界人士起来制止；集中全部兵力，迅速攻歼羊山敌人；不在鲁西南恋战，提早跃进大别山。于是三折之波平伏下去了。

在进军途中，刘邓指挥部进到汝河北岸时，遇到前有阻师后有追兵的险情。这是战略进军中遇到的最大难关。刘邓决心在当

面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于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了！

过了汝河一关，又是淮河一关。

刘邓指挥部在河边的一个小屋子里开紧急会议，最后邓小平同志说：伯承和际春先渡过河去指挥部队展开，李达组织渡河，我来对付后面的追兵！刘司令员当即定下决心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刻行动！在掌握了水情之后，部队终于全部渡过了淮河，胜利地进入大别山。于是，许多关于天意民心的神话传开了。

我军在大别山取得了战略展开和中铺、张家店、高山铺等歼灭战的胜利之后，敌人集中了三十三旅对大别山作重点进攻，刘邓决心以新来大别山的十纵、十二纵和原在大别山的一纵，在桐柏、江汉、淮西三区作战略再展开，蔓延游击战争，在陈唐、陈赓两兵团发动平汉战役的协同下，内线坚持与外线拉敌相配合，以打破敌人的围攻。这一决心下得很紧急，而且立即付诸实施，同时为了适应战斗环境，把刘邓指挥部一分为二。于是，敌人对大别山重点围攻的阵势被撕破了，我军在江淮河汉四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在战略战术上都展开了，迫使敌人防线从黄河退到长江，退了一千里。在这个期间，大别山内线坚持和外线展开的部队和地方工作干部，斗争都是十分艰苦和英勇的，他们高度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釜底抽薪，不怕烧手”的精神，许多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在斗争中牺牲了，他们将永垂青史！在这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锻炼出许多优秀的干部和战士，他们成了部队的坚强骨干。南征大军拖瘦了，但比之以往更加壮实了。

在这样的艰苦斗争环境中，树立良好的作风和风气，坚决而切实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在敌人战略要害地区立足生根取得胜利的根本大事。

在大别山，刘邓多次在讨论地方和部队工作的会议上，着重指出“必须树立一种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

和风气，必须反对一种浮夸、浪费、奢侈、铺张，不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并且指出：“如果能这样做，我们就为党为人民造福万代，否则就对党对人民贻害无穷。”这种树一代人之新风的远大思想，一直指导我们前进。

刘邓首长常说：如果我们部队没有良好的纪律，就和国民党军队一样，人民也要反对我们。邓小平政委多次向部队干部阐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含义。他说：“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毛主席在开始创立红军时就规定下来的，把军队的三大任务集中了一下，能够适合每个军人都能够做到和必须做到，即把打仗集中成为一切行动听指挥，把群众工作集中成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经济集中为一切缴获要归公。把我们的任务和政策具体化到八项注意中去，如对人要和气，是反对军阀主义，买卖要公平是工商政策，不搜俘虏腰包是俘虏政策等等”。他强调指出，

“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做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两个锋，是不够格的”。在大别山敌人集中三十三个旅对我作重点围剿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和李先念同志每到一地都亲自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邓小平同志指出，群众最痛恨的就是抛撒粮食，抛撒稻草，到处屙屎，还有住群众内房。后来，他去参加中央九月会议的时候，从西柏坡写信回中原说：“毛主席在几次会议及谈话中，提出全党当前任务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四句话，但强调指出，加强纪律性，即克服全党严重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为保障前两任务及革命胜利之中心环节。”

一九四七年的南征及南征后一年的艰苦斗争，转瞬过去三十多年了，这场斗争，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尤其是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为人民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遇事在关键时刻正确、迅速定下决心付诸实施的作风和气概，“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釜底抽薪，不怕烧手”的献身精神，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刘邓大军南征记》，经过许多身当其时、身当其事的作者的共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革命斗争的面貌，保留了这些可贵的革命史实。

目前，全党全国人民，在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下，正在奋起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些革命历史传下来的优良传统，对于今天我们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十分宝贵的。目前，党在中兴、国家在中兴，振兴中华是全国人民的愿望。这些革命历史上传下来的优良传统，对于党的中兴，国家的中兴，对于振兴中华，是十分宝贵的。因此，这部书的出版，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在这一点上，承担编辑出版任务的河南人民出版社及其编辑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 于北京

刘伯承同志论中原逐鹿(续完)

陈斐琴

六、三军会师，机动歼敌

中原逐鹿的第二阶段，是三军会师，机动歼敌。刘伯承同志说：

“自（一九四八年）四月至八月，我们野战军主要是宽大机动，实施分遣与集结的运动战，而配合以阵地战，不断地消灭敌人，而以开封与睢县、杞县之捷为尤甚。此时曾先后攻克洛阳、开封、襄阳重镇，使蒋介石中原重兵陷于僵局。”（《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编译前言》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刘伯承同志指出：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以后，形势起了新变化。因陈粟、陈赓、刘邓三部会合取得主动，我军收复石家庄、洛阳、运城、临汾、潍县各大城市，敌人的战略战术不得不改为‘能守则守，不能守则走’的方针。”（《中原区的任务和行动方向》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

当时，刘伯承同志对敌情、地形、战场选择等，都作了认真的研究和独到的分析。他对敌情的分析是：

“敌分五个集团，即卫立煌集团、李宗仁集团、张治中集团、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五个集团是战略布局上的五个点。恰好我们也是五个集团来对付敌人的五个集团。卫立煌已经抵不住

我东北集团的进攻，西北、华北、苏鲁敌人都在失利，自顾不暇。白崇禧集团在豫鄂皖防我渡江，假如我一过江，彼将如何堵击呢？白崇禧集团是其战略守势的最后防线，此点突破必将全盘瓦解。敌人有三怕：一怕进关；二怕过江；三怕入川。中原区就有敌人的两怕。在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张治中集团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能入川，且是敌之接合部，无法弥补。”

他对地形的研究：

“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江、淮、河、汉）。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内河。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应背靠武当山向东南发展。白河、汉水流域是古战场。将均县、房山划归豫鄂，南漳、保康、谷城划归桐柏，当阳、远安、荆门三县划归江汉，就是将汉水变成内河的开始。长江也会象黄河一样变成我们的内河。”

他对战场的选定：

“我们三个较好的战场：一、沙河；二、豫西；三、豫陕鄂。三个战场中以豫陕鄂为最好，有伏牛山、武当山之依托，有桐柏、江汉的前进阵地，水寨较少，没有大山，适于部队运动和作战。在敌方，因汉水、长江、大巴山之障碍，部队运动困难。

“我们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是面对点线的战争，故我们选择战场必须能宽大机动，豫陕鄂就适于此条件。”（《中原区的任务和行动方向》——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豫西彰辛庄高干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和结论）

三军会师、机动歼敌，在思想上要继续解决一个大别山和全局的关系问题，打主攻和打钳制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某些干部只看到自己在大别山吃了苦，自己那个部队削弱了，没有足够认识在大别山建设根据地的战略意义；照刘伯承同志的说法，就是只看到自己被敌人咬掉一个手指头，没有看到自己手里的利剑插

进了敌人的胸膛。认为自己的部队在大别山拖瘦了，不如从前了，今后作战只能打钳制，只能啃骨头吃不到肉。这个思想问题解决不好，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担负钳制任务或重入大别山作战，就会出问题。因此，在邓小平政委对大别山与全局问题一再在干部会上作讲解以后，刘伯承同志还是对干部反复讲这个问题，说明自己局部处于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友邻的胜利和全局的胜利，其中我们也贡献了一分力量，说明打仗总是有的主攻，有的钳制，有的吃肉，有的啃骨头，在内线作战时山东和陕北啃骨头，我们才吃上了肉，决不能现在自己啃几次骨头就输不起似的，表现出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样子来。刘伯承同志严格地批评这种思想。尖锐地指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送来了，大家都争着看，但有的同志说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想你的问题可以解决，第一明天胜利，第二光吃肉，第三妻荣子贵，万寿无疆！不然什么能解决问题呢？”

对于打钳制的问题，他也对干部说透了：“总之，我们要打大运动战，有的啃骨头，有的吃肉，有时你这回啃骨头，下回还啃骨头，第三回还啃骨头。我要说清楚，不要以为你这回啃骨头，下回就一定让你吃肉，没有那么回事。”（《在野直及三、六纵队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

七、论机动作战

三军会师，机动歼敌，就要在战术上解决一个机动作战问题。

刘伯承同志这样提出问题：

“一九四八年四月，我军主力主动从大别山转出来，进行机动作战，要在中原战场上歼灭敌人，把中原解放区建设成为前进基地。那末，我们对机动作战怎样认识呢？”

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打运动战，当然大别山内线坚持与外线机动歼敌是分不开的。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但机动只是消灭敌人的一个条件，本身不是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要拚刺刀，用枪弹、用炸药把敌人打死，这才是机动的本质。所以我们机动作战就是要消灭敌人，只有消灭敌人，才能解决问题，才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我们的战争是面对点线的战争，我们的战略是面对点线的战略；而蒋介石的战争是点线对面的战争，他的战略是点线对面的战略。面对点线的战争，我们的面就趋宽越好，越能包围点线。……现在看得很清楚，蒋介石已陷入被我‘线线切断、点点包围’的困境。例如石家庄被包围了，长春被包围了，其他被包围的点还多得很。被包围以后，便是瓮中捉鳖。长春是人口上了一百万的城市，每天吃饭就不得了，我想，飞机送一百万人的饭食，那才乱弹琴……今天他们的处境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就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

“打仗比如吃饭，这里一碗菜，那里一碗菜，你手里的筷子必须在这里插一下，在那里捻一下，筷子如果不动，肉是不会上筷子的。机动就得走路。有些同志怕走路，骂‘走死人！’走南方的小路，特别是水田地带的^①小路，跌跤跌的也是骑马跤。应当学会走路，去掉怕走路的思想。走路也是战术。战术有三个内容：一、行军；二、宿营；三、战斗。如果不会行军，不会宿营，还有什么战术？苏沃洛夫说：‘脚才是胜利的基本条件，手是辅助的。’”

他说：“机动和牛抵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战术。”他用动物的战术作比喻：“作战有三种战术：一、牛抵角；二、马的战术，用后蹄踢；三、狼的战术。”他不赞成“牛抵角”，他说：“牛抵角抵了半天消灭不了敌人。”他也不赞成马的战术，只会抱蹄子，黔驴之技，终究要被老虎吃掉。他比较赞赏狼的战

术。他讲过一个故事：“成都有一条坡路，狼就在坡路上静坐等着，一个推手车的人走到半坡上，狼就照准在他的屁股上吃一块肉，推手车的人放也放不下，跑也跑不掉，乖乖地让狼吃去一块肉。狼的战术是高明的。狼趁对方正暴露弱点的时候，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但是，刘伯承同志说：“我们是人，总比狼要聪明些。”他主张要广泛深入地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战略战术，取其对我今天有用的，尤其是要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上升为理论，来增长我们的聪明。抗日战争初期，对于机动，他就曾总结了这么几条：

“我们的作战的机动，必须：

(1) 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

(2) 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这一弱点。

(3) 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条件之下，完成机动，使敌人不能援救其被突击的弱点。”

教导人们善于寻找敌人弱点，把敌人强点变为弱点，懂得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来突敌人这一弱点，而又善于掌握战役、战斗的持续时间及其发展速度，掌握战役、战斗过程中条件的变化和退出战斗的时机和部署，使敌人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只能象抗战时太行山神头岭、长乐村战斗那样，战斗胜利结束后，敌机才来吊孝和轰炸自家遗弃的兵马的尸体；象大别山高山铺战役那样，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敌机还从武汉飞来炕热烧饼。这些关于机动的论点，是刘伯承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在《论游击战与运动战》一文中提出来的，在后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一阶段由于进行了三查三整、三大民主运动和整党，由大别山内线坚持的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转变到大兵团集中进行运动战和阵地攻坚战，是转变得比较顺利的。从四月至七月，胜利地进行了宛西、宛东、襄樊三次战役。开封、睢杞两战役，都是

华东野战军担任主攻，而由中原野战军担任钳制，中野进行的是阻击援敌的作战。六月间的开封战役，中原野战军除了以九纵、十一纵归华野指挥参加开封方面作战外，以一纵、三纵在华野十纵及豫皖苏军区部队一部协同下，于西平及其以东的东洪桥之线，阻击驰援开封之敌十八军，经两昼夜激战，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七月初，中野一、二、三、四等四个纵队，及一纵、豫皖苏军区部队各一部，为保障睢杞战役的胜利歼敌，又于平汉线西平地区及周家口、东洪桥地区阻击敌胡琏、吴绍周两兵团北援，经两日激战，胜利地完成第二次阻击作战任务。七月八日，中野一、二、三、四等四个纵队为配合睢杞战役扩大战果，再在西平、周家口地区对胡、吴两兵团进行第三次阻击作战，经四天激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这两次战役都是大兵团对大守敌和大援敌作战。两次战役的主攻部队共歼敌九万余人，钳制部队则三次阻击作战只歼敌七千余人，歼敌数字不及主作战的十分之一，也不及中野一个纵队在军区部队配合下打的襄樊战役歼敌数（一万九千余人）的二分之一。但因为事先把思想工作做好了，都能从全周着眼，三次啃骨头部队都很愉快。

八、中原逐鹿中的一局棋和两场球

中原逐鹿的第二阶段，是以第一阶段攻取洛阳这一局棋的胜利为先导，而以两场球的胜利宣告结束的。

一局棋的取胜。

三月十三日胜利结束的洛阳战役，是刘邓集中华野陈唐兵团和中野陈赓兵团的意见，在中央军委命令下实施的，是一次有计划的主动的一次战役行动，从这一战役的胜利，导致了中原战局全局的主动权落入我军手中，由此才有所谓四月开始的变化。

关于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三军会师，机动歼敌，刘邓于二

月十二日致粟（裕）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如下意见：

“根据总的任务，我们三军应确定向西。战役组织应以陈赓、陈唐两兵团先向西进，吸引十师、十一师向西，以便大别山部队集结，迅速补充新兵，尾十师、十一师之后，并吸引大别山之敌向西进。”

这是“向西！向西！向西！”的方略。

对这一战役的时机，规定“视情况而定”；对战役的要求，则“既要调动敌人，又要歼灭敌人”。

后来选定这一战役发起的时机，在三月初西北我军宜川大捷时，攻击的目标选定为洛阳。

三月初的宜川大捷，全歼敌二十九军军部，整编二十七师师部，整编九十师师部，及其所属之三十一旅、四十七旅、五十三旅、六十一旅，整编七十六师的两个团共二万八千余人，其中俘虏了二万人，二十九军军长刘戡被击毙。

这一伟大胜利，造成了我军威胁西安的形势，在全国战局中，蒋介石的西线受到巨大的震撼，敌统帅部就急调陇海线西安、郑州间的裴昌会兵团西援西安，调平汉线上的兵团北进郑州策应。于是我陈唐、陈赓两兵团就趁机于三月八日发起洛阳战役，花了一周时间，于三月十三日攻克中原重镇、九朝故都洛阳城，全歼青年军二〇六师，俘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果然调动了控制平汉线南段和信（阳）潢（川）公路围攻大别山的敌军主力十师和十一师西援洛阳，而且使十师、十一师拖在漫长的泥泞道路上受饿，成为疲惫之师。

两场球的取胜。

中原逐鹿中的两场球，是指攻克开封战役和攻克襄阳樊城的战役。

刘伯承同志在总结襄樊战役的时候，以打篮球作比喻，来描写开封和襄樊两个中原重镇，是如何在整个中原战局的微妙推移

中，被我攻取的。他说：“这一战役的胜利，是由于敌我两军对战于豫东、平汉线，将敌主力吸走，襄樊孤立，蒋（介石）白（崇禧）起初判断我无主力攻襄，襄阳可以固守，因而发兵较迟，一到我攻下，援兵已来不及。这与六月间刘邓与胡琏对战，粟裕与邱清泉对战，陈唐得钻隙攻克开封相类似，极似打篮球，双方互相牵制以一人乘机钻隙投篮的方法”。

九、中原逐鹿第二阶段的结局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一周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进攻进入第二年。这一天，中原军区负责人发表了《论中原战况》，对转入战略进攻以来，特别是中原逐鹿第二阶段，作了总结。指出：

今春以来，我军在中原战场歼敌野战军兵员达二十万以上。

“这些野战军损失，是蒋军在二年战争惨败中仅能保存的最大的机动兵力，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蒋匪自谓守城信心大于野战。……可是，当解放军一出手，便将攻占坚城全俘蒋军的事实，一一呈现于蒋匪之前。连加拿大新闻记者也说：‘开封被攻克，象征着蒋介石不能防守中国任何部分。’这一判断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即蒋匪盘据之中国任何城镇，只要解放军刀锋所指，必被攻克。这就是两年来战争进程中我蒋战斗力升降的标志。

“从去冬到今年夏季，前后歼灭蒋匪军的省保安团和县大队，……兵员总数约计达十万人。连同十几个专署百余个县府及所有反动军政机构之被摧毁，是将蒋匪在中原二十年来所经营的地方反动基础一扫而光。蒋匪在这方面的损失，以及中原人民解放事业在这方面的收获，应与野战攻坚主战场的收获列在同等地位。……这些损失，无论在全国战场抑或中原战场，都是蒋介石